

LIU SHAO GANG



刘绍刚，又署少刚，

1958年8月生于济南。

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1989年师从蒋维崧先生攻读文字书法专业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

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古文献研究室主任。

兼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

曾获1981年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二等奖。

1983年首届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一等奖，并多次参加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篆刻艺术展及中日、中韩和海峡两岸书法篆刻交流展。

著有《中国古代文房四宝》《篆书诗词名句选》《蒋维崧临商周金文》（与蒋维崧先生合著）《刘绍刚印存》《泉城雅集》《刘绍刚篆书彙典》等著作。

由庸堂张鹏先生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石鼓文》，是安思远先生收藏碑帖精品之一，封面有二百兰亭斋主人吴云（1811-1883）题签。庸堂在《神游物外心绪思远》中写到：此本除正文第八、九开（马薦鼓、吾水鼓）做了裁剪外，其余均为整拓，为存世最早的整拓善本，……以此遍检其他公、私所藏《石鼓文》拓本，可知是拓当属凤毛麟角，罕出其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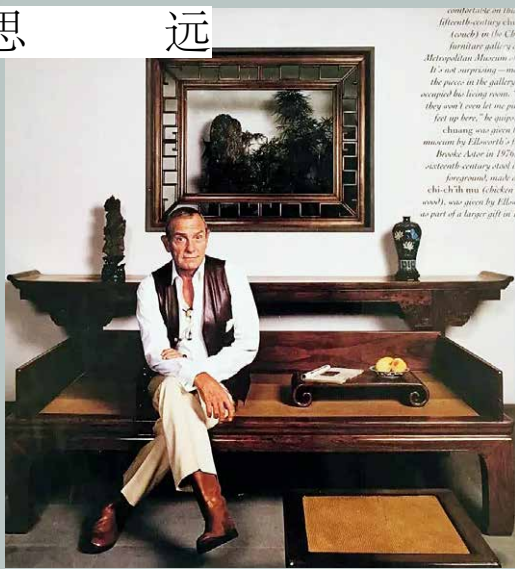


安思远旧藏善本碑帖

安 思 远

法扁者最好，谓之螺扁，徐铉谓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是也。”
[3] 同一时期的泰不华（1304-1352）还开始把石鼓文的书法揉入其篆书之中，这说明在元代，石鼓文拓片或翻印本的流传已经比较广泛并被书法家所学习。此次出版的《石鼓文》善本，曾经原收藏者吴云根据潘氏《石鼓文音训》定为元代至元己卯以前所拓，或如雅昌二玄比较审慎地认为属“元中间拓”，都是有据可依的。

近代以写石鼓文成名的书法家，当首推吴昌硕。光绪六年（1880），吴昌硕（1844-1927）曾寓吴云（1811-1883）两罍轩以《篆云楼印存》请教，很有可能在吴云处见过这本元中间拓《石鼓文》。在这之后，吴昌硕才开始学习石鼓文，对石鼓文的笔法浸淫日久，影响了他的书、画、印，使他卓然成为一代宗师级人物。



comparable on this
fifteenth-century chair
conceivably in the
furniture gallery of a
Metropolitan Museum.
It is not our pricing — no,
the price in the gallery
occupied his living room —
they aren't even let me put
feet up here," he quips.
Changing was given to
museum by Ellsworth's
Brooks Astor in 1976.
sixteenth-century stool is
European-made in
chi-chi-ku-ku (checkered
wood), was given by Ells-
as part of a larger gift on 1



吴昌硕篆书“西泠印社”

黄牧甫癸未（1883）作篆书四屏



吴昌硕己未（1919）作节临《石鼓文》四屏

与吴昌硕同时期的另一位篆刻家黄牧甫（1849-1908），1885年在北京国子监参加了重摹宋本《石鼓文》的工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黄氏的篆书也深深地植根于石鼓文之中。

这两位影响至今的书法篆刻家，都受益于石鼓文的滋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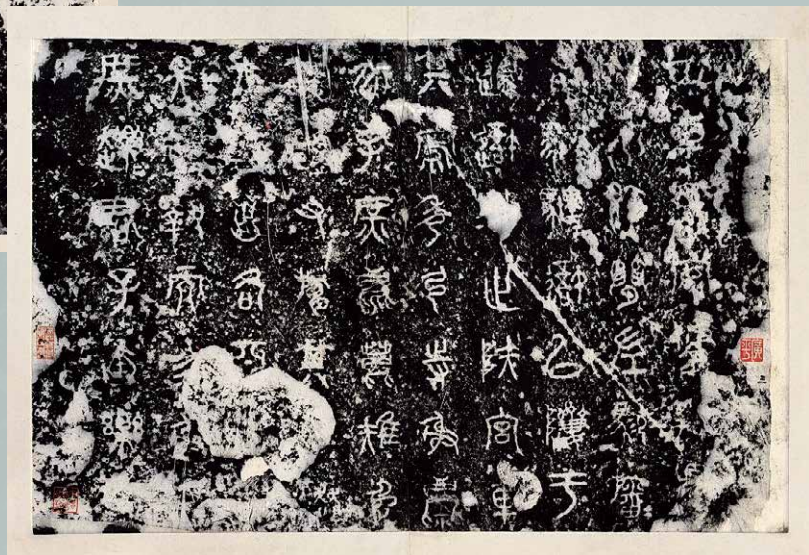


郭忠恕《篆书黄帝阴符经》



刘绍刚书法册页

我在八十年代初曾向蒋维崧先生请教如何学习篆书，蒋先生也是让我先临摹石鼓文。大概是因为在流行的秦篆拓本中，峰山刻石是南宋郑文宝根据徐铉的摹本翻刻，琅琊刻石存字太少，而泰山刻石，又被马衡、容庚、裘锡圭三位先生提出了其是否出于原拓的疑问，所以石鼓文是学习篆书最好的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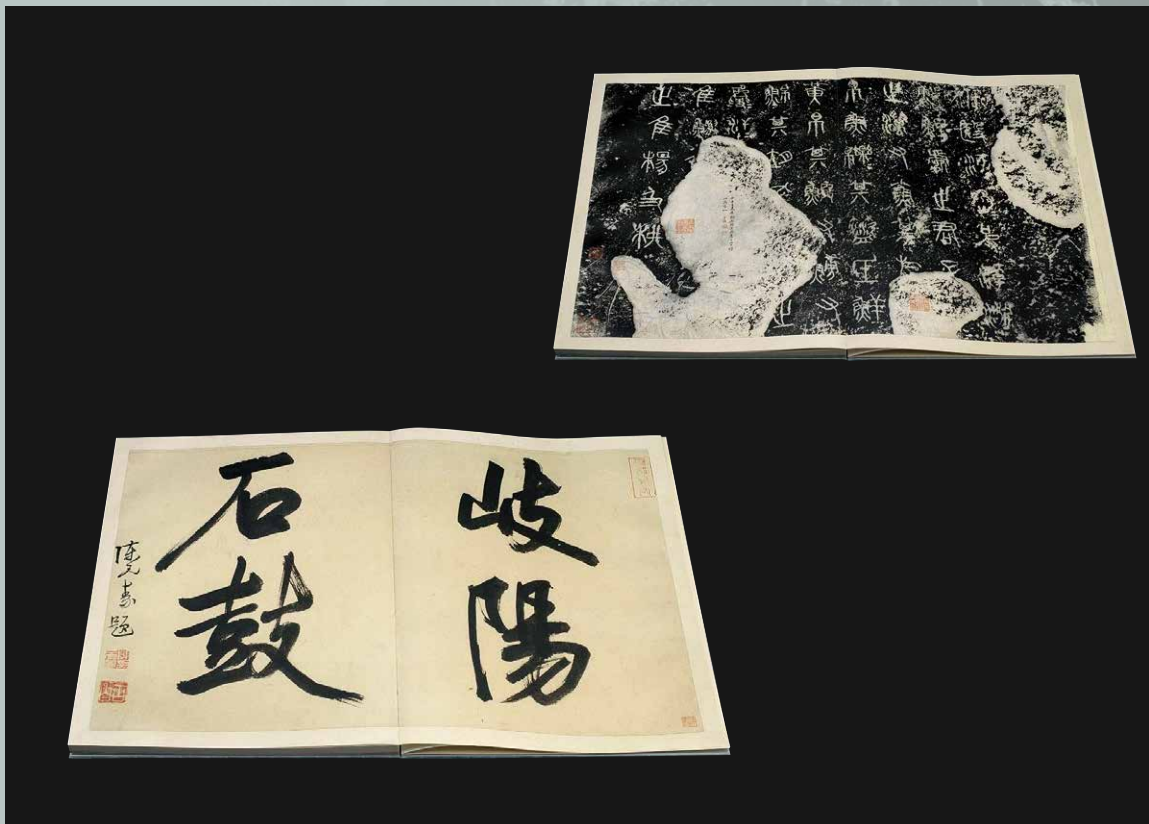


再来说说这次出版的元明间拓《石鼓文》是否为“最善本”的问题。在雅昌二玄的微信公众号推文《安思远旧藏“最善本”〈石鼓文〉付梓出版，即将发行！》中，我看到了马成名先生《关于明朝安国“十鼓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见》一文的主要观点，随即查找到了马先生的原文。

马先生在比对了原石拓本与安国本的“拼凑翻刻”现象，考据了“三本”题跋的“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现象，并证明了“三本”之上安国与华夏二人的收藏印均为“加盖伪印”现象之后，以为：所谓明朝大收藏家安国“十鼓斋”收藏的《石鼓文》是翻刻本，安国没有收藏过，而且安国亦没有“十鼓斋”和“天香堂”的室名，沈梧亦没有收藏过。是上海艺苑真赏社主人秦氏所伪造。也就是说现收藏在日本的《石鼓文》先锋、后劲、中权三本，皆出于民国时期的伪造！我相信这不仅对我个人，恐怕对整个学术圈都是一个颠覆性的意见。

我虽然不擅碑帖鉴定，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在古文献研究室随张燕生的徒弟王敏先生整理过四年多的碑刻墓志，对碑刻鉴定略知一二。从前曾写过《秦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和《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主要是研究早期碣石类石刻拓本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所依据的资料，除了晚清发现的好大王刻石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明朝安国收藏的165字本《泰山刻石》和《石鼓文》先锋、后劲、中权三本。

马 成 名 先 生



舊拓岐陽石鼓文精本

二百蘭亭益秘藏

马先生的文章虽然没有明言安国藏 165 字本《泰山刻石》也是出于秦氏所伪造，但明眼人不难在文章中发现其观点。如果马先生的结论不误，那这两篇文章的根基就会被推翻。于是我对马成名先生的文章展读再三，并找出一些相关的石鼓文拓片资料和学术著作进行对比，一时还没有发现可以否定马先生观点的线索。之后我又请教了专注于碑帖鉴定多年的上海冯磊先生，冯磊在微信中回复说：

其实日本的数册石鼓，我早就觉得不对，在几年前上图办石鼓展时，也跟马先生交流过，大家都觉得不对，也就没有更多的深入讨论。后来看他的文章，虽觉得论证还不是十分充分，至少已有的材料也差不多能说明这几册的问题了，毕竟一个人关注的角度不可能太多。我认为这几册可以确定是民国时作伪的。

这样一来，就目前所有传世可见的《石鼓文》拓本而言，其“最善本”就是本次雅昌二玄携手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远旧藏善本碑帖选”之元明间拓《石鼓文》。

最后说几句这本书的印制。十几年前，我在北京雅

昌印制中华书局的《蒋维崧书法集》时，结识了此次出版安思远旧藏《石鼓文》的庸堂先生。在关于艺术图书出版的交流之中，我们都认为书法碑帖的印制并不是黑白分明就可以了，而是要尽可能还原拓本的金石气息和书法韵味，在制版时需要反复调试才能达到满意效果。

雅昌作为国内印刷行业的标杆，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先进的印刷设备，或者什么“不传之密”，而是因为有许多像庸堂这样精益求精、喜欢“较真”的员工。

今天翻阅这本《石鼓文》，让人感觉如见真迹一般，我知道了庸堂先生在策划出版这套图书的过程之中，不仅仅只是编著，而且在幕后的印制中没有少下功夫。另外，这本书做成了大八开蝴蝶装，却能在翻阅时保持平整无粘贴痕迹，看得出在装订上也是下了功夫。

山东是石刻大省，存世秦汉刻石占国内总量的半数以上。过去山东出版了不少石刻方面的著作。这次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早的石刻——先秦《石鼓文》的最善本，对于石刻文字研究和书法的学习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